

從斷裂到重建： 資訊通訊科技對於越南籍 移民網絡的影響

From Fracture to Reconstruction: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on the Vietnamese Migration Network

鄭有容

Yu-Jung Chen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生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陳光華

Kuang-hua Chen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資訊通訊科技日新月異，提供移民更多元簡便的資訊管道，
進而再塑國際移民網絡結構。本文探究國際移民資訊使用現況，

通訊作者：陳光華 khchen@ntu.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3 月 17 日；接受日期：2021 年 8 月 13 日

運用弱連結優勢理論檢視資訊通訊科技對移民網絡影響。研究共計訪談 19 位，曾使用資訊通訊科技超過 2 年以上經驗的越南籍移民，初步結果顯示資訊通訊科技可作為串連移民關係的新興橋接工具，塑造了二種截然不同類型的移民網絡：提供心理支持的強連結網絡，以及擴張在地人際關係的弱連結網絡，其中弱連結移民網絡較強連結移民網絡，對於移民適應異鄉環境之過程更具實質影響性。

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advances rapidly, migrants are provided with diverse, convenient, and easy information channels to rebuild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architecture for migrant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formation use amo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 by using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ory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ICT on the migrant networks. This study interviewed 19 Vietnamese immigrants who had used ICT for more than 2 year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that ICT can be used as a novel bridging tool to connect immigrant relations, shaping two distinct types of immigrant networks: a strong tie network that provides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a weak tie networks that expands loc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weak tie networks have a more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migrants adapting to a foreign environment than strong ties networks.

【關鍵字 Keyword】

資訊通訊科技；移民網絡；強連結；弱連結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Migration Network;

Strong Tie; Weak Tie

壹、前言

從信件往返、國際通話乃至於網路通訊等不同遠距通訊方式的變革，移民通訊發展歷經長期演變的過程。資訊通訊科技未盡發展前由於跨區域遠距通訊尚未普及，移民與原居國親人間僅能通過書信往返與撥打長途國際電話方式聯繫，書信往來曠日廢時、購買國際電話卡則所費不貲，囿於時間與經濟等通訊成本因素考量，方處異地的

移民多半未能與原居國既有交友圈密切聯繫，在原居國既有日常生活的社會聯繫面臨被阻斷的情境考量下，國際移民被視為一種極端分離（radical detachment）的生活方式（Faist, 2000）。復逢移居至新國度後，移民所面臨的各階段求職就業、語言溝通、房屋租售等種種適應處境，在既有原居國聯繫被阻斷，而移居國的人際網絡尚未建立之際，移民在適應初期可獲得的社會資本與社會支持有限，因此國際移民往往被視為不得不的「畏途」（Vertovec, 2004; Horst, 2006）。

近年伴隨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蓬勃發展，各式行動載具與視訊軟體推陳出新，大幅改變遠距通訊的方式，人們可通過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與行動電話等各式設備聯繫，與遠方親人聯繫不再只聞其聲，還能見到遠方親人身影；另外行動數據與網路通訊技術發展逐漸成熟，移民不用再頻繁購買計價高昂的電話卡，綁定一次購足的月租費用後，即可獲得迅速且成本低廉的即時通訊，在遠距通訊方式日益簡便，與通訊成本逐漸減省的情況下，移民與遠方親人網絡聯繫更為緊密，無形間也提供更為厚實的社會支持，提升跨國移民的意願（Dekker & Engbersen, 2014）。除強化既有的移民社會支持外，資訊通訊科技也對於移民於移居國擴展人脈良有助益，基於文化背景、生活習慣差異以及語言溝通不良等因素，移民當地人際網絡往往不易開展，近年伴隨不同類型社群媒體平台興起，提供移民在虛擬環境中媒合關係的機會，成為移民認識與發現新朋友的管道（Sirikul & Dorner, 2016）。

不論是遠在他鄉的故舊，抑或在移居國家前結識的新知，這些與移民在實體或虛擬環境中觸及而產生的社會聯繫可通稱為移民網絡（migration networks），依據聯繫緊密程度，原鄉故舊的親人被稱為強連結（strong ties），移居國家結識的新朋友被視為弱連結（weak ties），兩種不同形式的移民網絡對於移民適應過程扮演決定影響，提供資訊交換、情感支持、跨國連結、人際擴展等不同程度的協助（Kelly, 2003; Dekker & Engbersen, 2014）。Granovetter 自 1970 年代起即針對強、弱連結的社會網絡結構進行系統性研究，提出弱連結的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論，認為儘管強連結網絡成員間具有同質性（homophily），但成員間高度相似的特質雖有助於在團體間互動，如欲進行跨團體的訊息傳遞，則不如弱連結網絡成員來的有效率。雖然弱連結成員間互動並未較強連結來的緊密，但由於成員背景富異質性（heterogeneity），也可為移民帶來日常生活資訊偶遇的機會（Granovetter, 1973）。移民網絡概念的提出，賦予跨境移民研究新的

啟發，從事移民研究不應僅以個人經驗為基準，而應全盤考量其家庭、當地社群網絡、跨國社群網絡。

資訊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不僅提供移民更多元化與簡便的資訊資源管道，也改變移民資訊需求與其尋求資訊的行為，進而再塑國際移民網絡的社會結構，透過弱連結優勢理論的輔助，賦予研究者詮釋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網絡發展的機會。特別在移民網絡相關研究中，雖已有部分文獻聚焦於探討強連結網絡與弱連結網絡，但以資訊通訊科技為主軸的探討仍未盡明朗，特別社會網絡不是靜態的關係網，而是動態、發展且複雜的，伴隨移民需求、社會位置與時間推移而變動，因此有深入探究的必要（Boyd, 1989；Ryan, Sales, Tilki, & Siara, 2008）。有鑑於此，本研究分成瞭解移民資訊使用現況，與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網絡的影響兩個脈絡深入探究，透過越南籍外籍配偶的質性訪談，瞭解其所偏好使用的資訊設備與軟體，並進一步建構移民在移居至臺灣後，如何藉由資訊通訊科技建立移民網絡，進而協助日常生活適應的過程，藉以描繪我國越南籍移民網絡的面貌。

貳、文獻探討

一、移民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情形與限制

現代人與行動載具密不可分，資訊通訊科技已成為移民取用資訊的重要管道，除加速移民資訊傳播速度並大幅降低訊息傳遞成本外，也對於移民適應與安置階段的資訊行為產生變化（Khoir, Du & Koronios, 2015）。在移民前置階段，為改善對於移居地的訊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情況，移民會利用電子郵件、電子佈告欄、網站、搜尋工具、聊天室、社群網站等線上工具蒐集資訊，並利用所獲取的資訊評估與擘劃移民計劃，並於線上平台之上分享觀點與徵求具體建議（Beladi & Kar, 2015）；在移民過渡階段，當移民甫進入移居國時，面臨高度的生活壓力，舉凡住所、就業、語言能力、生活指引、孩童就學、金融服務等迫切需求需要即時被滿足，而資訊通訊科技是移民取用資訊的主要管道，可擴速串聯大量、複雜的資訊，以便移民快速融入新的環境，也成為移民吸收移居國當地政治、文化、社會活動新知的窗口（Cornelius, Komito & Bates, 2009; Caidi, Du, Li, Shen, & Sun, 2020）。

有鑑於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帶來的改變，Diminescu（2008）提出連結移民（connected immigrant）概念，認為資訊通訊科技提升移民跨國連結（transnational connectivity）的能力，這種跨越地理與經濟限制的連結感（sense of bonding），促使移民可透過手機、電腦等載具與移民原生家庭維持聯繫，並可維持日常溝通、消息更新與政治參與等活動，有助於強化既有的移民網絡，使得跨國聯繫更為稠密。而在網路上與遠方親人持續接觸，也為移民的日常生活，帶來具效率且價值的社會支持，透過與異地親人間頻繁交流訊息、尋求鼓勵與陪伴與提供實際援助，提升移民移居他國的誘因（Hiller & Franz, 2004; Burrell & Anderson, 2008）。另一方面，資訊通訊科技也為移民帶來參與遠方親人日常生活的可能，運用視訊軟體為輔助，移民可以遠距視訊方式在兩地間更新原鄉家庭的日常生活，進而參與原居國親友的節慶活動（Vertovec, 2004; Kissau, 2012）。

然而，資訊通訊科技固然可協助移民數位融入（digital inclusion）當地社會與新生活，降低生活中的不確定感，促使移民融入當地生活（Allard, 2018; Ndumu, 2020）。但其發展也造成移民與全體國民間的數位落差持續加劇，儘管現今資訊傳播成本已大幅下降，囿於先天社經資源限制、教育程度與都市化程度差異，仍有部分移民未具備合宜資訊設備，或者不足以支付網際網路的資費，影響移民取用資源能力（Ono & Zavodny, 2008; Kennan, Lloyd, Qayyum, & Thompson, 2011; Lloyd, Kennan, Thompson, & Qayyum, 2013; Alam, 2015）。而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7 年的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報告顯示，移民不論在發送電子郵件、文書處理、網路查詢資料、網路學習、社群網站、藝術資料收集、生活資訊收集、線上查價、網路購物、網路金融、網路就業資訊、查詢政府資訊、查詢衛教資料、網路掛號等資訊應用情形，均低於全體國民平均資訊使用量，成為我國移民資訊科技發展的隱憂（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

此外，儘管資訊通訊科技提供便於人們分享資訊的媒介，加速資訊傳播的速度與提升資訊分享的機會，然而線上資訊往往未經求證與把關，助長不當資訊的散佈，提升移民遭遇網路詐騙的風險，造成個人危機或權益損害（Gordano Peile & Ros Hajar, 2016）。且移民有限的資訊操作能力也成為移民在數位時代謀職的困境，當代許多工作基本條件須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資訊技能成為找尋工作的重要門檻（Lloyd & Wilkinson, 2016; Ndumu, 2020）。林志忠、翁福元與黃淑玲（2015）的移民數位落差與需求研究報告即顯示，移

民對於資訊素養課程有殷切需求，迫切需要網路通話與即時通訊、中文輸入、電腦基本操作、收發電子郵件、參加網路社群、數位照相剪輯、檔案資料上傳等課程內容，然而卻又因為工作沒有時間、不知哪裡可以學、小孩需照顧、開課時間不恰當、語言溝通等問題影響參與資訊素養課程的意願。陳緯倫（2009）研究我國外籍配偶亦發現，基於良媳、良妻與良母美德實踐，移民常會犧牲個人網路使用時間，從中忽略電腦網路對生活的重要性，進而影響其資訊設備購買與學習技能意願。

透過前述探討，足見資訊通訊科技在支援移民的短期立即需求，與長期需求上都扮演重要的媒介。儘管國際間訊息傳遞日益便利，促成遠距通訊即時聯繫的契機，帶來與遠方親人維持感情的可能，但是資訊通訊科技也突顯移民數位落差與資訊素養教育的問題，雖然新住民家庭持有電腦、上網比率、資訊使用率已持續攀升，但無論是從資訊技能與素養或各項網路活動參與情形來看，新住民都仍舊落後全國一般民眾，顯示新住民的數位機會仍有必要進一步提升，特別是面對中文閱讀能力較弱的東南亞籍移民，如何提升移民數位參與、電腦操作、資料查詢、程式撰寫與繪圖軟體能力，進而促進其經濟、文化、教育與健康發展，成為我國政府迫切的挑戰。

二、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網絡的影響

社會網絡是指在團體之間個體成員的直接或間接聯繫，社會網絡學者認為個人在團體與社會中的行為與態度，受到其所處社會網絡的影響，社會網絡分析即是研究行為者彼此之間關係的一門學科（Borgatti, Jones, & Everett, 1998）。社會網絡分析從社會交往形式中，探究個體與團體之間互動模式的規律性，瞭解互動網絡如何影響認知、信念、決定、行動與使用資源之學問（Wasserman & Faust, 2019）。換言之，社會網絡分析既是人際間微觀層級的安排，同時也是宏觀社會結構的橋樑，透過結構性研究，可分析社會系統內不同行動者間人際關係的模式，瞭解個體在關係網絡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與位置，並有助於解釋社會意義、威權規範、資源分配系統、社會知識與文化特質結構，所賦予不同網絡位置行動者之意義（Freeman, 2017）。

在社會網絡分析當中，行動者、關係與網絡扮演重要角色，行動者即網絡中的人、事、物；關係代表行動者之間的連結與性質；網絡則是由行動者與關係形成的結構（Knoke & Yang, 2008）。藉由行動者、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可呈現社會結構並概念化行動者間關係總和，標

示出行動者相關連結，讓研究者瞭解網絡結構特性與關係特徵，詮釋其關係模式的成因（Prell, 2015）。而社會網絡所強調的關係模式，適用於探討移民間人際網絡，並以移民網絡具體涵蓋社會網絡與人際網絡兩者概念。移民網絡實際上係將移民視為行動者，將移民之間的人際關係當作行動者之間的連結，運用社會網絡的結構進而瞭解移民人際關係的特徵，並依據關係的強度（strength）、涉入共同活動的程度、聯繫頻率（frequency）等，將關係進一步區隔為強連結與弱連結兩類，兩種類型的連結對於測量信任、情感支持、資源取得、資訊傳播等影響良有助益（Granovetter, 1973; Borgatti, Mehra, Brass, & Labianca, 2009; Dekker & Engbersen, 2014）。

強連結指個體成員間網路關係重疊程度高者，例如個人在生活中經常接觸的親人；反之連結重疊程度低者為弱連結，例如鄰居、同事等（Wasserman & Faust, 2019）。一般而言，強連結所代表的是同質性較高的團體，當團體間連結程度緊密，團體成員的同質性較高，也較容易凝聚共識，產生更大的影響力，然而也因強連結的同質性較高，網絡成員特性重疊度密集，無法帶來有幫助的消息或資源；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弱連結優勢理論，認為弱連結是串連人際社會資本的橋樑，帶來不同的工作機會，是擴張網絡、獲取利益的關鍵。弱連結則可視為一種橋梁資本（bridging capital），促進異質性的群體間訊息串聯與資訊提供，可用於擴展社會網絡（Burt, 1978; Lancee, 2010）。

資訊科技有助於移民強連結與弱連結網絡的形塑，移民不僅可透過資訊通訊科技與家鄉維持社會聯繫，也有助於在移居地發展當地社會網絡。在移民網絡之中，其強連結當屬於在原鄉家庭的親人。Mehra 與 Papajohn（2007）認為網路提供一個維持跨國聯繫的管道，透過與移民母國保持聯繫的基礎上，提供重要的社會、心理與情緒上的支持，可給予移民心理安慰並且克服孤立。Srinivasan 與 Pyati（2007）認為移民停留在美國只是過渡，當移民在美國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後，其或許會回到故鄉發展，因此資訊科技扮演與異鄉生活連結的工具，使移民保持與親人聯繫。Dekker 與 Engbersen（2014）發現資訊通訊科技可強化與原生母國的親屬、朋友之間的強連結，使其不受地理限制，使相隔兩地的朋友仍能繼續保持緊密的連結。且伴隨資訊科技的便利，新移民可透過手機、網路與遠方親人聯繫，移民在新環境所無法取得的資訊性或情感支持，也可以透過跨國聯繫網絡取得，提升移民移居他國的意願，使移民將想法付諸實踐（Caidi, Allard, & Quirke, 2010;

Komito & Bates, 2011)。

儘管移民的強連結網絡對於移民適應與移民移居意願的促進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移居新國家的過程中所認識的新朋友，在移民資訊傳播與流動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Hiller 與 Franz (2004) 認為這些新朋友的來源可能來自於移民社區中的先鋒移民，由於同鄉背景的支持，成為移民在移居新國家後所接觸的人際資源，由於新生活適應資訊的訊息容易在弱連結的管道中傳播，而這些移民也會提供許多諸如住房或就業問題等日常生活上的協助，而這些弱連結在現實生活中對於新移民所提供的幫助，與遠在他鄉親人、朋友的強連結來的更為即時。

資訊通訊科技可增強與維持既有連結，並創建當地社會連結，補強移民原本缺乏的社會資本，透過網路連結的社會網絡，成為移民累積人際關係的重要途徑。資訊通訊科技形塑網路社交空間 (internet social space)，促使在移民網絡中處理地理分散狀態下的人們進行交流，連結各式志趣相投的移民進行各項資源交換，並從中獲得利益。Baron, Neils 與 Gomez (2014) 探究美國西雅圖地區的西班牙裔新移民日常生活社交網絡，發現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的當地性 (local)、全國性 (national)、跨地域性 (internationally) 均產生連結性，利用資訊科技與當地的社群網絡產生聯繫，透過社群媒體的參與，促成在美國的過渡時期中，找到歸屬與認同，讓新移民跨越邊界，提供其社會資本與社會支持系統，移民網絡的健全與否也成為移民決定是否移居的主因，對於移民的心理健康、母職效能與生活適應都有正面效應。

不論是強連結還是弱連結，研究顯示資訊通訊科技所提供的連結性提供移民強烈的社會支持，提高移民需求被發現且被滿足的機會，透過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社會網絡所能獲得的實質或潛在性資源 (Ye, 2006)。資訊通訊科技強化其強連結、弱連結，並且開發移民的潛在網絡的影響，改變人們過往利用網路主要為獲得資訊的現象，社交目的成為人們網路使用的動機，讓具有類似背景與共同興趣的移民得以互相認識，網路與社群媒體滿足人們與他人互動的需求，使移民藉此維繫既有社會網絡，並認識新朋友建立異質性的人際關係 (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究資訊通訊科技對於越南籍移民網絡的影響，研究

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探究越南籍移民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現況，著重瞭解其所使用的資訊設備、軟體，以及資訊服務內容。第二部分則探究資訊通訊科技，探究強連結與弱連結網絡對於移民的分別影響，並比較兩者在資訊通訊科技背景下，所發展的移民網絡關係。在立論基礎上，本研究以 Granovetter（1973）所提出的弱連結優勢理論來發展研究問題，參考 Komito 與 Bates（2011）對於移民強連結的見解，其認為家庭的力量不受地理限制，不論親人身處何處，永遠是最為緊密的連結。據此以移民前後、區域差異（母國與移居國）、親疏遠近（親人與朋友），歸納移民的強連結或弱連結網絡，在移民的強連結網絡的部分，本研究將移民位於越南的親人（包含父母、手足）視為強連結，弱連結則聚焦於越南籍移民移居到臺灣後，透過資訊通訊科技管道所結識的朋友（不包含移居國的配偶、配偶父母與子女）。

在對象抽樣上，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選取訪談對象，盼能尋求與研究目的相符的越南籍移民，受訪者需具備以下條件：為婚配形式來台的外籍配偶、國籍為越南籍、具資訊通訊科技超過 2 年以上經驗。選擇婚配形式來台外籍配偶的原因，係參考范明秋（2008）的看法，考量外籍配偶遠嫁來台，不再擁有原生國度的社會網絡與資本，外籍配偶必須透過網絡重建人際關係，成為探究移民網絡的重要對象；在受訪者國籍部分，係依據內政部戶政司（2021）的調查，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我國外裔、外籍配偶人數共 565,299 人，除大陸、港澳地區配偶外，以東南亞地區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五國外籍配偶為主，其中以越南籍外籍配偶人數最多，共 110,659 人，佔全體外裔、外籍配偶人數的 19.58%，以此選擇越南籍移民為研究對象。

在招募管道上，透過臉書上某大型移民線上社團進行招募，該社團旨在提供在臺灣的越南移民於生活適應上互助討論，在成員人數、張貼文稿數量上頗具規模，現已包含一萬逾名社團成員。研究者首先於社團中發布招募公告，待逐一募集受訪者後，研究者接續進行資訊通訊科技使用背景調查，必須通過背景審核才能成為受訪對象。最後在研究中總計訪談 19 位越南籍移民（受訪者背景資訊如表 1），移民年齡以 21 歲至 30 歲居多（佔全體樣本數 53%）、來台居留時間以 1 年至 5 年比例最高（佔全體樣本數 42%），受訪者背景資訊詳如表 1。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質性研究取徑瞭解越南籍移民網絡發展，質性研究強調以研究對象的用語和意義架構來詮釋事物，重視個人主觀的心理歷程和經驗世界，適合非主流瞭解受訪者的思考歷程與

主觀感受的揭露，呈現移民日常生活中面臨的真實情境。加上外籍配偶普遍可歸類為較為弱勢且缺乏話語權的族群，難以量化取徑傾聽移民的經驗和感受。以質性研究尋求對於特殊情境的全面理解，期盼藉由探索移民族群的主體經驗，反思現有圖書館資訊服務的內容（Fidel, 1993）。

表 1
受訪者背景資訊表

組成	樣本數	比例	組成	樣本數	比例
年齡			來台居留時間		
20 歲 (含) 以下	1	5%	1 年以下	4	21%
21 歲至 30 歲	10	53%	1 年至 5 年	8	42%
31 歲至 40 歲	3	16%	6 年至 10 年	1	6%
41 歲至 50 歲	2	10%	11 年至 15 年	4	21%
51 歲至 60 歲	3	16%	15 年以上	2	10%
學歷			子女人數		
小學	1	6%	無	11	59%
國中	3	15%	1 個	3	15%
高中	6	32%	2 個	4	21%
大學	6	32%	3 個	0	0%
大學以上	3	15%	3 個以上	1	5%

在流程設計上，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所彙整的基礎結構研究問題，並事先擬定移民科技使用訪談大綱，藉由移民社團的引薦，針對 3 名越南籍外籍配偶進行前測，並逐步修改訪談題綱以符合研究目的。為確保研究信效度，研究者先與受訪者進行基礎認識，瞭解受訪者資訊通訊科技背景，在實際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基本上依循訪談大綱中所列示與研究主題相關問題訪問，但不侷限於訪談大綱的內容及順序，將視訪談中研究者與參與者的實際對話而定，逐一與受訪者確認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若欲疑義當下與受訪者確認，每人訪談時間長度為半小時到 1 小時，並於民國 109 年 11 月至 110 年 1 月間進行訪談；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填寫接觸摘要單，作為省思訪談內容與調整訪談方

向之用，並以終於受訪者語句描述忠實呈現原意，研究資料編碼後透過質性研究軟體 NVivo 第 12 版分析與詮釋。

在研究範圍部分則參酌 Adkins 與 Sandy（2020）的研究設計，將資訊通訊科技範圍定為用於管理、處理、傳播與應用資訊所採用的各種技術，具體包括資訊設備、資訊軟體與平台等；在研究限制部分，訪談對象儘量選擇來台適應時間較長、中文表達能力佳的移民，以便瞭解移民的實際感受，但無形之中也有可能因此忽略，甫移居來台的越南籍移民相關意見，且部分問題涉及到個人私隱，例如移民在回答人際關係議題時，未能盡然確保移民所回答的完整性與正確性；且為使論述成果更為聚焦，本研究選擇以越南籍外籍配偶為視角進入田野，儘管外籍配偶以女性占絕大多數，仍有小部分比例的外籍男性配偶未納入討論，形成在研究推論上的限制。

肆、研究發現

一、移民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現況與限制

（一）資訊通訊科技未盡發展前移民聯繫的斷裂

相較於現今社會的資訊與通訊發展普及，以往的移民跨國通訊並非易事，在資訊通訊科技未盡發展前，國際長途電話與國際電話卡是維持原鄉家庭的親情網絡的重要途徑，但保持聯絡仍需有足夠的經濟資本與相應的資訊設備，也不是每位移民都有經濟資本與夫家支持，使得跨國聯繫變成昂貴的願望。依據受訪者 Q18 表示，剛來臺灣時撥打國際長途電話非常昂貴，影響自己與原居國親人聯繫的頻率與意願，有時候家人沒有接到電話，無法即時通訊溝通，會使得移民心身焦慮。

以前記得我第一年過來，我們也沒有手機，就是用家裡的電話打，那個很貴。打一通要一千多元，有時打一打聊一聊要繳電話費的時候就心很痛，要繳好幾千元；後來的話有賣電話卡，買那個卡是比較便宜，但還是要幾百元，打電話回家裡也不一定有人接，常常也會擔心家裡，但是不知道怎麼辦（Q18：8-11）。

伴隨社群媒體與行動通訊的日益進展，移民從長途電話與電話卡，轉變為透過通訊媒體與親人聯繫，不僅可以節省通訊成本，也促成移

民與親人之間關係的轉變，且配合即時影音的效果，讓移民與家人聯繫時更能產生心理慰藉，進而長期而持續的維繫親情。

那時候沒有 LINE 這麼方便，我們買電話卡或是用家裡電話打，因為是用預付卡的關係，有時候網路訊號不太好，現在越來越發達的話，就可以有 LINE 跟對方去聊了，也不用花那麼多錢在通訊上。關係也會有改變，像是常常會跟他們（家人）聊天，很久沒有看到他們，聊聊家裡的事情（Q15：14-17）。

（二）透過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建立移民聯繫

在資訊設備使用部分，研究者發現越南籍移民與本國人在使用上並沒有太大差異，移民如同本國國民一般，擁有多元類型的資訊設備，如電腦、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且透過 Q11、Q18 與 Q5 的訪談結果可發現，移民對於智慧型手機呈現高度依賴狀態，隨時使用不離身，並由於其便於攜帶與操作方便的特性，也被運用多種日常生活資訊尋求的情境，例如用於查詢課堂資料、網路購物與學習中文當中。

電腦、平板都有，但比較常用手機耶！用的時間不一定，有時候無聊會用超過 8 個小時，幾乎每天都會用 4 個小時，手機都黏在我身上，看上班時後的情況，有危險性的就不能用手機（Q11：3-5）。

家裡大部分都是用手機比較多，因為覺得手機比較方便，現在小孩開電腦等比較久，直接用手機查比較快；我女兒是大學畢業了，我兒子是大二，有時後他們上去查一些資料、有時候是上網買一些東西、有時候我買什麼，會請他們上網看看價錢多少，如果比較便宜我們就上網買（Q18：20-24）。

大部分只會帶手機，大概每天都會（使用），剛開始過來中文都不懂…。我去市場，有個東西看到了不懂，我用手機拍下來，上中文課的時候問老師（Q5：30-31）。

至於在社群媒體部分，越南籍移民的資訊使用情形則與本國人略有不同，像是受訪者 Q2 即表示，越南人偏好使用臉書來進行日常聯繫，不論是日常聊天或者是問候遠方親人都是藉由臉書來進行。

大概都是用臉書，來臺灣也會用 LINE，因為越南沒有很多人用 LINE，所以我跟越南朋友，大概都會透過臉書聊天，也可以常常跟親

人聯絡，問候知道對方的情況（Q2：10-11）。

在通訊軟體部分，受訪者 Q6 與 Q18 提到，越南人擁有當地偏好使用的通訊軟體，相較於 LINE，越南人大多會使用 ZALO 來進行跨國通訊，而使用 ZALO 的原因，在於通訊表現，使用 ZALO 的通訊較 LINE 更為清楚。

因為越南很少人用 LINE，在越南我們有自己的 APP，就是 ZALO，然後如果你跟越南人有聯繫的話，他們一定有 ZALO，很多越南人用這個（Q6：36-37）。

用 LINE 就是跟親人講話或聊天比較方便，有時候覺得收訊不是很好，ZALO 收訊品質比較好一點、LINE 比較差，有時 LINE 講的話都不好，用 ZALO 比較清楚（Q18：14-15）。

（三）越南籍移民的數位資訊行為

1. 線上購物行為

移民會透過不同的資訊軟體作為管道，來尋求、獲取與使用資訊。例如受訪者 Q8 即表示，社群媒體、通訊軟體已被視為重要的線上購物管道，LINE 或臉書不僅用於建立移民聯繫，移民也會踴躍參加線上 LINE 群組或臉書社團，透過群組成員之間的資訊分享，獲取買賣資訊的重要資訊。

LINE 群組大部分都是網購比較多，偶爾看看賣衣服的，買一些衣服呀、還有化妝品；參加越南人賣東西的社團，加入一些購物的社團，FB 會看它們賣什麼，買賣東西，我也有在網路買賣東西，賣飾品給越南人，用 FB 回答訊息（Q8：19-21）。

2. 線上娛樂行為

研究亦顯示，除利用社群媒體、通訊軟體為資訊通訊科技取用管道外，伴隨現今線上影音平台日益發達，移民也將目光焦點從傳統的臉書、LINE，進而轉移到更多元的新興資訊管道中，受訪者 Q3 認為 Youtube 在其移居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Youtube 提供多元的影音資訊，不論是移居國或是母國的網路紅人影片，都可以達到休閒娛樂的效果。

就是店裡忙得時候，可以上 Youtube 看那種好笑的影片，通常看唱歌的、看網紅也有，有看臺灣的、也有看越南的網紅都有，兩個都

有看（Q3：9-10）。

（四）移民於線上資訊環境所遭遇的負面經驗

若論及使用資訊科技的負面經驗，越南籍移民多半表示自己或是親人在網路上曾遭遇到詐騙的經驗，例如受訪者 Q5 提到，很多不肖商人會透過網路來進行詐騙，移民透過網路下單後與實際商品不符，或是沒有收到商品的情況屢見不鮮。

就是有那種詐騙的，突然透過網路來介紹產品，然後收到產品是不一樣的東西、或是訂單轉錢沒有收到貨，然後聯絡就沒有聯絡上，就滿多都是買賣方面的（Q5：24-25）。

此外，研究亦顯示移民在臺灣工作經常有匯錢回越南的需求，由於正式的匯錢管道需收取高額的手續費，也有業者會透過 LINE 仲介跨國匯兌服務，但實際上是金融型態的欺騙行為。

因為我們有一些同鄉都在臺灣工作！每個月都會寄錢回去，會用 LINE 來訊息，然後幫忙匯就會被騙之類的，就沒有幫我匯。有一次來問說要不要幫忙匯錢，結果我請她寄 6 萬元的台幣到越南，她有把匯款單給我，結果我相信她，後來又寄給她 10 萬元，發現沒有錢進來（Q13：16-19）。

二、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網絡的影響

（一）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強連結網絡的影響

伴隨資訊通訊科技日益發達，越南籍移民開始使用遠距通訊方式聯繫強連結網絡，主要係採用透過特定資訊設備連上通訊軟體或社群媒體與親人聯絡。在通訊軟體部分，越南籍移民會使用 LINE 來跟母國父母、家人聊天，不僅能即時更新親人近況，也可以接收到越南當地發生的大小事情，並且參與越南當地的重要活動，成為家鄉生活的延續，敦使移民跨越時空邊界，即使與親人分隔兩地，仍能維持緊密的連結。

有 LINE 以後比較方便，可以知道老爸老媽的情況，然後如果越南的有比較重要的事情、節日，我們就可以在這邊透過軟體聊（Q11：11-12）。

儘管移民未與家人相處於相同地理區域，但仍為家族成員，受訪者 Q2 表示，除通訊軟體之外，越南籍移民也會透過社群媒體與母國親人聯繫，透過臉書發佈照片、訊息與網路留言，表達日常慰問與關懷，並能隨之更新家鄉最新消息，排解適應生活的壓力。

以前在越南的時候，跟爸媽就可以直接見面聊天，過來後我們都是用臉書來聊天，大概都是聊我平日生活怎麼樣，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是看到有什麼有趣的新聞，跟家人分享（Q2：6-8）。

而受訪者 Q14 認為，資訊通訊科技的優點在於可以即時與親人聯繫，例如如今 COVID-19 疫情嚴峻之際，移民網絡間隨時都能透過社群媒體更新遠方親人動態資訊。

如果有疫情的話，大家都可以透過社群媒體聯繫的到（Q14：6-8）。

儘管資訊通訊科技有助於增強移民強連結社會網絡，然而相較於移民弱連結社會網絡的影響，依據 Q18 與 Q3 的受訪意見，發現儘管強連結網絡之間所聯繫的話題，主要係以更新日常生活、問候為主，但平常囿於工作忙碌，在聯繫上並不相當頻繁，處於有事情才聯絡的狀態。

現在會用軟體跟越南親人聯絡，因為彼此都有工作在做，多半是有需要的時候才打，沒有需要的話，也沒有在打，因為那邊人家有的也是在忙工作，我們就覺得有空再聊，沒有事也很少聊（Q18：26-28）。

因為時間的問題，我有點忙，或是家人有點忙，沒有那麼常聯絡的，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才會跟我講，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們也是要上班也是要休息，比較少打擾他們（Q3：10-12）。

（二）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弱連結網絡的影響

而受訪者 Q4、Q5 與 Q17 表示，越南籍外籍配偶除與強連結親人進行跨國聯繫外，移居國親人所提供的生活適應協助有限，此時資訊通訊科技有助於擴張人際網絡，移民會利用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突破實體限制，在線上環境採主動或被動的形式與移民弱連結社會網絡聯繫，進而獲得適應臺灣當地社會的適應資訊，這些資訊包含租屋、搬家與創業資訊等。

有些朋友會在群組裡面上傳一些要賣的東西，會參加一些這樣的

群組，再來就是一些找室友的群組、租房子的社團，房子是靠 FB 社團找的 (Q4：24-25)。

臉書 (Facebook) 就是朋友圈，然後就是有些社團，像是「越南人在臺灣」有一些生活上的資訊，就是如果要搬家的話，會知道去哪裡找搬家，有時候是有什麼缺 (工作職缺) 網友都會 PO (發文) 上去，比較好找到工作與房子的資訊 (Q5：20-22)。

就是像這個店面呀！FB 上每天都會有 PO 文，我就在群組上面看到有開店的，就找到店面 (Q17：12-13)。

至於論及移民的強連結與弱連結網絡中實際帶來的協助時，越南籍移民多半表示在臺灣透過線上管道所認識的朋友遠較於在越南的親人較具影響力。強連結的網絡僅對於移民心理層面產生撫慰的影響，由於在越南的親人畢竟與移民相隔兩地，在資訊通訊科技上的聯繫多半是以日常問候為主。受訪者 Q7 表示，強連結的親人多半是溝通問候等，真正遇到困難時，移民的強連結網絡反而派不上用場。

我覺得遠方的親人沒什麼幫助，就是聊聊天解悶而已，通常都是問候彼此，問你好這樣子，都是一些問候，問誰怎麼樣等等，都是一些家裡的事，越南的親人只是用來關心生活、還有就是節日要不要回國等等 (Q7：8-10)。

受訪者 Q2 與 Q6 也表示，有別於強連結網絡所提供的心理支持，弱連結網絡也被移民視為更實質的協助，人際網絡之間會協助移民仲介工作，或是查詢租賃房屋相關資訊，並且伴隨時間的推移，透過越南籍移民網絡間不斷資訊分享的氛圍，也促使移民繼續幫助下一個網絡成員，最終形成良善互助分享的氛圍。

因為我現在是在臺灣，在臺灣的朋友當然是對我比較有幫助，在臺灣遇到問題，越南的比較沒辦法幫助，就一般家裡的事情，跟朋友的話，就是有朋友會幫我找工作，也找到一些房子 (Q2：31-33)。

在 FB 的朋友可以提供我比較多幫忙，像是如果我信用卡沒錢的話，可以馬上跟他們講，就是經濟的支援。在臺灣有認識很多網友，參加 FB 的群組、LINE 的群組，我的工作室就是朋友介紹給我，我也會透過網路幫其他同學找工作，就是我也幫他們 (Q6：22-25)。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目前我國對於瞭解東南亞籍移民如何發展線上資訊網絡，進而聯繫、尋求與接收資訊的研究仍相較有限。作為嘗試將社會網絡與資訊通訊科技概念，融入移民議題之探索，本研究結合移民、資訊通訊科技與社會網絡三者概念，瞭解移民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現況，以及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網絡的影響。在資訊通訊科技的現況部分，研究顯示臺灣的越南籍外籍配偶在網路社會生活參與熱絡，大多數移民頻繁使用社群媒體、通訊軟體取用資訊，舉凡網路消費、日常生活問題解決、線上影音娛樂等，主要透過智慧型手機來查找資訊，形塑多元且豐富的網路資訊尋求行為，無形中也提供移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且有價值的支援，協助原本因婚配移民而斷裂的移民網絡，由資訊通訊科技所提供的連結性予以重建。

在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網絡的影響部分，研究顯示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的強連結與弱連結網絡產生不同影響。首先是移民的強連結網絡，越南籍移民使用遠距通訊的方式來聯繫異鄉親人，會透過通訊軟體與社群媒體兩種形式以文字留言、視訊等不同形式與異鄉的父母分享生活，資訊通訊科技扮演強化原生家庭聯繫的催化劑，由於跨國移民與親人間相隔兩地，原居國家中婚喪喜慶等重大事件未必能返家參與，這樣的母國連結有助於移民與家鄉維持聯繫，提供移民心理支持與克服孤立，並營造歸屬感。前述看法與張安君（2013）針對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的在地人際網絡結果有所呼應，資訊通訊科技被稱為通往家鄉的任意門，讓移民與原生家庭成為穿越時空的一家人，在本研究中進一步發現儘管資訊通訊科技協助移民與母國維持聯繫，但聯繫係以日常問候為主，較無法為移民日常生活帶來實質助益。

其次在移民的弱連結網絡部分，研究發現資訊通訊科技代表新興仲介人際資源的橋接渠道，有助於移民擴張個人網絡，協助越南籍移民在台適應。移民頻繁的參與社群媒體上的臉書社團或是通訊軟體的群組以尋求資訊，解決日常生活的適應問題，不論是在引薦工作、房屋租賃與尋求創業機會上，皆可以透過資訊通訊科技尋求解答。這樣的結論某種程度上也呼應弱連結優勢理論，研究顯示移民會以資訊通訊科技為中介，透過異質性程度較高的弱連結網絡，促進不同背景移

民之間訊息串聯與資訊提供，進而凝聚互利分享的氛圍，賦予越南籍移民一種強化弱連結與活化潛在連結的可能性。更進一步的說，弱連結移民網絡較遠在於母國的強連結網絡更具實質影響性。

二、建議

（一）利用資訊通訊科技營造圖書館移民網絡

除以移民的強連結與弱連結社會網絡二元式的劃分外，建議後續研究可依照移民場域、日常生活型態等不同種類，來分類移民網絡，並調查其對於東南亞籍移民造成的實際影響。許雅惠（2009）曾將外籍配偶的移民網絡分為夫家、鄰里、同鄉社群與工作職場四類，其指出此四類型移民網絡儘管帶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然而皆屬於水平式的移民網絡，在資訊近用層面對於移民的挹注實屬有限。Gidengil 與 Stolle（2009）提出營造特定移民網絡的重要性，特定的外部連結將對於移民在資訊取用上有所幫助，特別是移民在適應生活時容易缺乏社會聯繫與支持，圖書館可藉由社群媒體與資訊通訊科技的輔助，營造移民的圖書館資訊服務社團，建議圖書館可利用社群媒體豐富媒體內容與互動功能，在線上移民網絡間傳遞正確且有價值的訊息。

（二）以手機與社群媒體為題推動正確資訊判別教育

早期數位移民研究多半強調數位發展（ICT for development, ICTD）的概念，ICTD 旨在弭平移民與一般國民間的數位落差，藉由教導移民正確的資訊取用方式與技巧，提升移民就業機會與公民參與，實踐數位融合願景（Landry & Kuglitsch, 2009; Baron, Neils, & Gomez, 2014）。我國政府現已陸續投入移民數位發展大型計畫（例如教育部偏鄉數位關懷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縮減婦女數位落差計畫、內政部新住民資訊素養教育計劃等）。然而經過本研究實際調查，越南籍移民並非在資訊設備抑或相應的資訊取用技巧上有所落差，而是移民在尋求資訊時有其特性，透過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取用資訊並發展在地網絡。然而伴隨手機功能與社群媒體類型不斷推陳出新，移民進而衍生對於新興媒體的功能操作問題外，研究也發現手機與社群媒體資訊詐騙情形層出不窮，我國政府應即刻著手調查移民資訊素養教育課程內容，以手機與社群媒體使用為主題教導移民判別正確資訊觀念，避免假消息的傳播造成移民權益損害。

（三）比較不同東南亞國籍移民的資訊軟體使用情形

在受訪者國籍的選擇上，囿於時間與經濟成本的因素，本研究僅選擇以越南籍外籍配偶為調查對象，然而事實上來自不同東南亞國家的移民，可能由於其資訊基礎建設普及程度不一，在上網比率與資訊近用比率存在程度上的差異，以我國印尼籍移民為例，由於其年齡相較年長、教育程度較低、月收入低於最低工資的比例較高等因素，相較於大陸越南與其他國籍移民，呈現上網比率低落的情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此外，研究也觀察到我國越南籍移民在使用資訊使用偏好使用通訊軟體 ZALO，與我國國人普遍使用 LINE 上有所差異，這也與 Dekker 與 Engbersen（2014）所發現德國籍、巴西籍與烏克蘭籍移民在媒體使用差異有所呼應，建議有關單位應正視不同國籍間移民的背景差異，不應將東南亞籍移民資訊需求以一視之，而應正視其多元特色差異。

參考文獻

- 內政部戶政司（2021）。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檢自：<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 【Departmen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21). *Ge xian shi wai yi wai ji pei ou ren shu yu da lu (han gang ao) pei ou ren shu*.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 (in Chinese)】
- 林志忠、翁福元、黃淑玲（2015）。新住民數位落差與需求之研究（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研究報告）。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Lin, C.C., Wong, F. Y., & Huang, S. L. (2015). *Xin zhu min shu wei luo cha yu xu qiu zhi yan jiu*. (nei zheng bu wai ji pei ou zhao gu fu dao ji jin bu zhu yan jiu bao gao). Nantou,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in Chinese)】
- 范明秋（2008）。潑到國外的水：國際婚姻中越南配偶與娘家間的跨國連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臺北市。【Pham, M. T. (2008). *"Overseas-splashed water": Transnational link between Vietnamese spouses and their natal famili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aipei. (in Chinese)】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106年新住民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7).

- 106 nian xin zhu min shu wei ji hui xian kuang yu xu qiu diao cha bao gao. Taipei: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in Chinese)】
- 張安君 (2013)。線上與線下的連結：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的在地人際網絡（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高雄市。【Chang, A. C. (2013). *Online and offline: The social network of Vietnamese marriage immigrants in Taiw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in Chinese)】
- 許雅惠 (2009)。魚與熊掌：新移民婦女的社會資本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2)，1-54。https://doi.org/10.6785/SPSW.200912.0001【Sheu, Y. H. (2009).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ethnic: Analyzing immigrant wives' social capital.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13(2), 1-54. https://doi.org/10.6785/SPSW.200912.0001 (in Chinese)】
- 陳緯倫 (2009)。數位增能之研究：以外籍配偶學習使用電腦網路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市。【Chen, W. L. (2009). *A study of digital empowerment: The case of the foreign spouses of learning and using the computer and Interne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Kaohsiung. (in Chinese)】
- Adkins, D., & Sandy, H. M. (2020).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CT use of Latina immigrants to the US Midwes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57(3), 102072.
- Alam, I. (2015). The digital divide and social inclusion among refugee migrants: A case in regional Austral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 28(2), 344-365. https://doi.org/10.1108/ITP-04-2014-0083
- Allard, C. (2018). Imagining Winnipeg: The translocal meaning making of Filipino migrants to Canad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9(10), 1193-1204. https://doi.org/10.1002/asi.24038
- Baron, L. F., Neils, M., & Gomez, R. (2014). Crossing new borders: Computers, mobile phones, transport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among Hispanic day laborers in Seattle, Washingt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5(1), 98-108. https://doi.org/10.1002/asi.22949

- Beladi, H., & Kar, S. (2015). Skilled and unskilled immigrant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 developed country.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3), 666-682.
- Borgatti, S. P., Jones, C., & Everett, M. G. (1998). Network measures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21(2), 27-36.
- Borgatti, S. P., Mehra, A., Brass, D. J., & Labianca, G. (2009).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323(5916), 892-895.
- Boyd, M.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3), 638-670.
- Burrell, J., & Anderson, K. (2008). I have great desires to look beyond my world: Trajectori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 among Ghanaians living abroad. *New Media & Society*, 10(2), 203-224.
- Burt, R. S. (1978).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locking corporate directorates. *Social Networks*, 1(4), 415-435.
- Caidi, N., Allard, D., & Quirke, L. (2010).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immigrants.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4(1), 491-531.
- Caidi, N., Du, J. T., Li, L., Shen, J. M., & Sun, Q. (2020). Immigrating after 60: Information experiences of older Chinese migrants to Australia and Canad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57(3), 102111.
- Cornelius, I., Komito, L., & Bates, J. (2009). Virtually local: Social media and community among Polish nationals in Dublin. *Aslib Proceedings*, 61(3), 232-244. <https://doi.org/10.1108/00012530910959790>
- Dekker, R., & Engbersen, G. (2014). How social media transform migrant networks and facilitate migration. *Global Networks*, 14(4), 401-418.
- Diminescu, D. (2008). The connected migrant: An epistemological manifesto.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7(4), 565-579.
-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1143-1168.
- Faist, T. (2000). Transnation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and cultu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2), 189-222.

- Freeman, L. C. (2017).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 Fidel, R. (1993).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researc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5, 219-219.
- Gidengil, E., & Stolle, D. (2009).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immigrant women's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3(4), 727-763.
- Gordano Peile, C., & Ros Hajar, A. (2016). Immigrants and mobile phone uses: Spanish-speaking young adults recently arrived in London.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4(3), 405-423.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Hiller, H. H., & Franz, T. M. (2004). New ties, old ties and lost ti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diaspora. *New Media & Society*, 6(6), 731-752
- Horst, H. A. (2006). The blessings and burdens of communication: Cell phones in Jamaican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Global Networks*, 6(2), 143-159.
- Kelly, P. (2003). Canadian-Asian transnationalism. *Canadian Geographer*, 47(3), 209.
- Kennan, M. A., Lloyd, A., Qayyum, A., & Thompson, K. (2011). Settl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social inclusion.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 42(3), 191-210.
- Khoir, S., Du, J. T., & Koronios, A. (2015). Linking everyday information behaviour and Asian immigrant settlement processes: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ustral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46(2), 86-100.
- Kissau, K. (2012). Structuring migrants' political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et: A two-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9), 1381-1403.
- Knoke, D., & Yang, S. (2008).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Komito, L., & Bates, J. (2011). Migrants' information practices and use of social media in Ireland: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roceedings of the 2011 iConference* (pp.289-295). Seattle Washingto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 Lancee, B. (2010). The economic returns of immigrants'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4(1), 202-226.
- Landry, C. F., & Kuglitsch, R. (2009). La Casa Hogar—Bringing families into the community. In M. Crandall & K. E. Fisher (Eds.), *Digital inclusion: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ty technology* (pp. 43-52). Medford, New Jersey: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Lloyd, A., & Wilkinson, J. (2016). Knowing and learning in everyday spaces: Mapping the information landscape of refugee youth learning in everyday spac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42(3), 300-312.
- Lloyd, A., Kennan, M. A., Thompson, K. M., & Qayyum, A. (2013). Connecting with new information landscapes: Information literacy practices of refuge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9(1), 121-144. <https://doi.org/10.1108/00220411311295351>
- Mehra, B., & Papajohn, D. (2007). "Glocal"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 convergences in Internet use: Cross-cultural behavior of international teaching assistants in a culturally alie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 Library Review*, 39(1), 12-30.
- Ndumu, A. (2020). Towar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immigrant information behavior: A survey study on information access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 among US Black diasporic immigrant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76(4), 869-891. <https://doi.org/10.1108/JD-04-2019-0066>
- Ono, H., & Zavodny, M. (2008). Immigrants, English abilit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Social Forces*, 86(4), 1455-1479.
- Prell, C. (2015).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istory, theory & methodology*. Los Angeles, CA: Sage.
- Ryan, L., Sales, R., Tilki, M., & Siara, B. (2008).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capital: The experiences of recent Polish migrants in London. *Sociology*, 42(4), 672-690.
- Sirikul, P., & Dorner, D. (2016). Thai immigrant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ur and percept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s role during the

- settlement process. *Library Review*, 65(8/9), 535-548.
- Srinivasan, R., & Pyati, A. (2007). Diaspor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Reframing immigrant-focused inform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8(12), 1734-1744.
- Vertovec, S. (2004). Cheap calls: The social glue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4(2), 219-224.
- Wasserman, S., & Faust, K. (2019).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e, J. (2006). Traditional and online support networks in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1(3), 863-876.

附件－訪談大綱

伴隨資訊科技高速進展，對於移民的資訊取用與聯繫網絡產生很大的改變。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從斷裂到重建－資訊通訊科技對於越南籍移民的影響」為題進行調查。本研究共分成移民基本資料調查、移民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現況、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網絡的影響三部分探究。收集資料僅作為分析使用，感謝您撥冗協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生 鄭有容 敬啟

一、移民基本資料調查

【填寫說明】這部份問題主要是在瞭解您個人資料作為研究依據，相關資料只做研究分析使用，請您依實際狀況填答。

1. 性別

☐ 男性 ☐ 女性

2. 年齡

☐ 20 歲以下 ☐ 21-30 歲 ☐ 31-40 歲 ☐ 41-50 歲 ☐ 51-60 歲
☐ 60 歲以上

3. 學歷

☐ 小學以下 ☐ 國中 ☐ 高中（職） ☐ 大學（專） ☐ 碩士 ☐ 博士

4. 來臺時間

☐ 1 年以下 ☐ 2-3 年 ☐ 4-5 年 ☐ 6-8 年 ☐ 9-10 年 ☐ 10 年以上

5. 原國籍

☐ 越南籍 ☐ 其他 _____

6. 工作狀況

☐ 全職工作 ☐ 兼職工作 ☐ 家庭照顧 ☐ 其他 _____

7. 婚姻狀況

☐ 已婚 ☐ 離婚 ☐ 喪偶 ☐ 分居 ☐ 其他 _____

8. 子女數

☐ 0 人 ☐ 1 人 ☐ 2 人 ☐ 3 人 ☐ 4 人以上

9. 居住地區（所居住的縣市與鄉鎮）

二、移民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現況

1. 請問您家裡有沒有資訊設備（如電腦、手機、平板等）？若有，你比較經常使用的設備為何？使用時間多長（如每日／每周／每月多久）？
2. 若沒有或不常使用資訊設備，是什麼因素（如不知道如何使用、感覺不需要、經濟條件不允許、因為工作或教養小孩沒有時間、家人不同意）？
3. 請問你使用行動載具上網經常上哪一些網站（如政府網站、健康網站、找尋工作、閱讀新聞、查詢生活資訊）？
4. 請問你上網的用途為（如休閒娛樂、聯繫親人、搜尋資訊）？你曾嘗試過資訊創新服務嗎（如 Uber、Uberat、Foodpanda、行動支付）？
5. 請問你經常使用的社群媒體為何（如 FB、IG、Youtube）？有使用那些功能（如發布動態、分享訊息、參與社團、線上互動、影音瀏覽）？
6. 請問你在使用設備或網路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如設備或軟體操作、文書處理、找不到所需訊息）？

三、探究資訊通訊科技對於移民網絡的影響

1. 請問您會利用通訊軟體（如 Line、Wechat、Skype）與母國親人或朋友聯絡嗎？自從有通訊軟體後，你與母國親人間的關係有產生變化嗎（如聯繫更為密切、可以參與當地活動、瞭解親人即時動態）？
2. 透過通訊軟體，請問您與母國親人間多討論哪些議題（如孩童教養、生活適應等）？您認為母國親人在線上可提供您什麼支持與協助？
3. 請問您曾利用網路管道（如社群媒體、網路論壇、交友軟體、通訊軟體）結交朋友嗎？您有參加什麼網路社團（如 FB 社團、LINE 群組）嗎？

- | |
|---|
| 4. 請問您認為資訊通訊科技對於您結交朋友有沒有影響？你有沒有網路上認識的朋友轉化成好友的經驗？這些朋友對你日常生活適應上有什麼幫助（如找工作、租房子）？ |
| 5. 請問您透過網路認識的朋友，有沒有被騙的經驗？或是您認為在線上結交朋友，可能帶來什麼問題？ |
| 6. 請問您認為遠方的親人還是當地的新朋友對於您適應日常生活哪一個比較有幫助？ |

**From Fracture to Reconstruction: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on the Vietnamese Migration Network**

Yu-Jung Che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uang-hua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o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immigrants from South Asia. The study consists of two major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Vietnamese immigrants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ith a focus on the used information equipments, software and contents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second part is to focus o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tself, investigating the separate impacts of strong ties and weak ties in social networks on these immigrants, and comparing the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of these two modes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Granovetter's (1973)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ory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as the theoretical base for developing research questions. Relatives (including parents and siblings) living in Vietnam were regarded as strong ties, while friends (not including spouses, spouses' parents, and children living in Taiwan) made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ter the Vietnamese immigrants settled down in Taiwan were deemed as weak ties.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these Vietnamese spouses were conduct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ng how these immigrants build up strong ties and weak ties in social networks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helping them adapt to a new life in a foreign country. One of the goals was to depict an image of Vietnamese immigrants' social networks in Taiwan.

Research Methods

The qualitative study approaches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for obtain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pecial contexts. It was expected that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immigrant groups, we could reflect on the contents of current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purposive sampling approach was adopted to select Vietnamese interviewees that were qualified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goals. The interviewee should be a Vietnamese spouse who is married to a Taiwanese and moved to Taiwan, and with a more than two years' experiences of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terviewee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a large Facebook group for Vietnamese immigrants. That particular group aim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Vietnamese immigrants to discuss issues regarding adapting to life in Taiwan. That Facebook group is with a large scale in numbers of both members and posts. A recruitment notice was posted in the Facebook group. After contacting potential interviewees, a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on usag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as conducted for identifying qualified interviewees. A total of 19 Vietnamese immigra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interviewees of this study. The majority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with an age ranging from 21 to 30 years old (taking 53 % of the sample size), and with a residence period in Taiwan from one to five years (taking 42% of the sample size).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the three concepts of immigran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and social networks were incorporat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Vietnamese immigrants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impacts of these technologies on immigrants' social networks. For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t revealed that Vietnamese spouses in Taiwa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online social life. Most of the immigrants frequently used soci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oftware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y relied heavily on smart phones to seek information regarding online shopping, problem solving in daily life, and digital entertainments, etc., and presented diverse and plentiful onlin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rovided to these immigrants with effective and valuable supports in daily life, and helped them reconstruct social networks that were disconnected due to marriage migration.

As to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n immigrants' social networks, it revealed in this study tha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immigrants' strong ties and weak ties in social networks. With strong ties in social networks, these Vietnamese immigrants used long-distanc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contact relatives in homeland. They shared life with parents in homelands with text messages or video conferenc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software and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elped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s with their primary family. Being away from their homelands, these immigrants had difficulties participating in important family events; such connections with homelands helped them maintain contacts, and provided psychological supports for overcoming social isolation and creat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s to the weak ties in social networks, it revealed in this study tha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a new bridging channel for mediating human resources, and helping Vietnamese immigrants expand social networks and adapt to life in Taiwan.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se immigrants looked for solutions to problems in daily life, such as seek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finding jobs, renting or leasing a residence, or starting a business. The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ory. It revealed in this study that these immigrants us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the medium to exchange messages with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to weak ties in social networks, which was with a relatively hegemonic composition. It promoted an atmosphere of mutual sharing and endowe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strengthening weak ties and activating potential connections. Furthermore, weak ties in social networks in Taiwan had a more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se immigrants than strong ties in homelands.